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美教育部遭裁撤,“寒冬”倒逼高校改革

郭英剑

在本专栏刊发于2月11日的文章《特朗普“兴师问罪”,美教育部命运“凶多吉少”》和2月25日的文章《“独立性”这面旗帜,美高校还能打多久》中,我着重探讨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教育部与美国高校的高教政策与措施。目前情况又有新的发展,特朗普已签署行政命令撤销教育部,同时大幅削减联邦资金。这导致许多顶尖高校冻结人事招聘、调整学校政策和相关措施。

裁撤联邦教育部,还教育权于州政府

美国当地时间3月20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解散美国联邦教育部,将教育管理权归还各州。而在签署仪式现场,他谈到了解散教育部的必要性。

特朗普表示,联邦教育部自1979年成立以来,耗费了大量资金,但未能显著改善学生的学术表现。因此,“我们要关闭它,而且要尽快关闭它”。他还表示要将教育权归还各州。教育应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掌控,以更好满足当地需求,减少联邦政府的过度干预。签署文件时,特朗普对在场教师表示“我会照顾好你们”。他承诺尽管联邦教育部解散,但对低收入、残疾和特殊需求学生的项目将被保留。

美国媒体曾在报道中表示,长期以来,以共和党为主流的美国保守派普遍支持地方控制教育的政策,支持帮助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的择校方案;以民主党为主流的美国左翼选民则大多支持公立学校和多元化项目提供充足资金。事实上,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多个地方关于基础教育(K-12)课程的争论进一步加剧,全国各地的家长在学校董事会会议上愤怒地与官员对峙。可以说,共和党与民主党双方的斗争一直针锋相对,矛盾难以化解。

如今,特朗普又将双方的争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并试图重新设计美国的高等教育,采用减少资金投入的方式,推动高校取消其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政策。

教育部是否真的会关闭

在美国,联邦教育部负责监管全国约10万所公立学校和3.4万所私立学校,85%以上的公立学校的经费来自州和地方政府。但教育部要为有需要的学校和项目提供联邦拨款,包括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教育支付教师工资、资助艺术项目和更换过时的基础设施等,同时还要负责监管无力支付大学学费的美国家庭持有的1.6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

现在来看,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首先只保留教育部的基本职能,如维持管理学生贷款、为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提供资源等。特朗普在表示,此事最终会提交国会投票表决,直至完全取消该部门。

在各种媒体对特朗普签署此次行政命令的报道中,大都不忘说一句——虽然有总统令在,但完全解散教育部仍需美国国会批准。换言之,虽然行政命令已下达,但裁撤的过程仍然面临法律和立法方面的挑战。

不过在我看来,由于共和党在美国国会

人工智能时代,导师的角色应重新定义

林雨竹 蒋双双

今年年初,国产大模型DeepSeek火爆出圈,再次引发了学术界对人工智能(AI)的激烈讨论。这一技术突破不仅深化了其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的应用,更推动了高校科研生态的全面升级。

此前,国内多所高校已陆续推出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助手,比如清华大学的“清小搭”、北京理工大学的“艾比特”、哈尔滨工程大学“程小智”等。而DeepSeek的本地化部署与高校既有人工智能系统的深度融合,也为科研工作提供了更智能、更精准的智慧服务。

在此背景下,林林总总的人工智能助手不仅成为研究生的科研“神器”,也被部分研究生奉为“真正的导师”。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人工智能对传统导师角色的挑战,导师的权威性、育人坚守与角色转型等,成为了当今研究生教育领域亟待厘清的核心命题。

导师权威正在消解

传统教育模式中,导师凭借学术积淀、经验积累,以及对学科前沿的敏锐洞察力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然而,人工智能的“全能性”正在消解这种基于知识垄断的权威——从文献综述框架生成、实验方案设计到论文语言润色,仅需数秒即可输出高度结构化的“参考答案”。其知识储备的广度和信息处理的效率优势不仅改变了知识传递的路径,更动摇了导师作为“知识唯一来源”的地位。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的介入使学术资源的获取趋于扁平化。传统导师通过长期积累形成的知识壁垒被打破。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学生可以快速触达海量信息,



虽然高校改革的起点带有特朗普政府施压的色彩,但如果高校应对得当,有可能在震荡中倒逼改革,带来某些正向转型的契机。

议员中占多数,这就为总统裁撤教育部提供了制度性支持。也就是说,共和党凭借多数党的优势,更容易推进相关立法,在党内达成共识的议题上(如缩小联邦机构规模、去中心化治理等)更是如此。

因此,从党派力量上看,特朗普提出的方案很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至少不会遇到太大阻碍,特别是在目前共和党选民普遍支持“教育地方化”和“削减联邦开支”的情况下。因为教育部只剩下最基本功能,未来将很快丧失此前拥有的权力与大笔资金,所以即便依旧存在,也会名存实亡,难逃最终被裁撤的命运。

在我看来,特朗普面对的更大问题其实是民意。确切地说,是来自普通教师与教师工会的坚决反对与抗诉。美国教师联合会负责人温加顿在一份声明中说得坚决而果断:“法庭见。”据上个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反对与支持关闭教育部的受访者比例约为65%比30%。

联邦资金被砍,哥伦比亚大学首当其冲

如果说对于教育部,特朗普采用的是大规模缩减其人员,致使其走向名存实亡的裁撤之路,那么,他对美国高校的施压则更为直接——大幅度削减联邦资金。据媒体报道,由于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联邦资金,甚至采取措施限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研究型大学的资助,导致美国高校出现了一波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第一所被削减经费的高校。

今年3月初,特朗普政府表示,将取消对哥伦比亚大学约4亿美元的联邦资助,理由是该校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内的反犹太主义行为。特朗普政府要求该校作出多项改变,包括执行纪律政策、实施抗议活动规则、禁止戴面具、宣布一项追究学生团体责任的计划、赋予

除了MIT,美国哈佛大学也作出反应。当

执法部门权力,以及审查中东研究课程和招生情况等。

当地时间3月23日,哥伦比亚大学宣布进行一系列政策调整,包括限制示威活动、制定新的纪律处分程序及立即审查中东课程等。可以说,面对政府的“撤资”,哥伦比亚大学作出了明显让步。董事会写到,他们认为这些改革符合学校的价值观和使命。

哥伦比亚大学还表示将任命一名新的高级教务长,对全校各地区的课程进行“彻底审查”,首先从中东课程开始。该校发言人沃诺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学校已向联邦政府提供了一份文件,概述了规则和政策的变更。沃诺说,新高级教务长将于近日任命,“重点是促进区域研究的卓越发展”。他表示将提高教师队伍的知识多样性,以确保中东研究的公平性,并将在全校范围内致力“机构中立”。该校还承诺对招生政策进行审查,并指出犹太学生和黑人学生的录取率一直在下降。

“寒冬”已至,高校纷纷急刹车

有人将此轮联邦政府资金被撤给高校带来的影响比喻为“财政寒冬”。受此影响,美国许多顶尖高校不得不采取停止招聘、暂停教师出差等举措。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算是最早作出反应的高校。早一个多月前的2月14日,该校教务长巴恩哈特与执行副校长兼财务主管肖尔就向全校师生发出公开信,明确表示要“冻结非必要职位的招聘”。

公开信称,过去几个月里,他们一直在模拟联邦层面的变化可能对财务带来的各种影响。鉴于联邦资金和政策的前景不明朗,他们对预算和招聘采取了更加谨慎的态度——这与MIT过去在面对突如其来、不可预测的财务挑战时的做法如出一辙。

他们表示:“由于联邦层面的持续变化导致预算削减和持续的不确定性,我们正在采取预防措施,全面冻结所有非必要职位的招聘,新措施立即生效,直至另行通知。”

除了MIT,美国哈佛大学也作出反应。当

导研究生挖掘数据背后的逻辑漏洞,而非止步于表面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导师的教育目标要从“授鱼”转向“授渔”,重点培养研究生的自主探究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逐步承担起文献整理、归纳等技术性工作,导师得以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其角色重心应向培养研究生科研“软实力”转移。这种“软实力”包含研究生个人的综合素质与高阶思维能力,它既是学术创新的基石,也是科研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创设多元场景来培养,包括在学术汇报中锻炼语言表达与思辨能力,在项目合作中提升团队协作与领导力,以及在日常科研中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帮助研究生逐步树立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更重要的是,研究生与人工智能的密切互动将倒逼导师摒弃“高高在上”的传统姿态,建立彼此平等对话的新型师生关系。在这一模式中,人工智能提供技术性支持,导师聚焦思维启发,研究生则在双向互动中形成独立见解。例如,尝试“人工智能+导师”双轨指导模式,将技术效率与人类智慧深度融合,以提升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人工智能的冲击实际上是推动教育返璞归真。当知识获取趋于便捷,教育的本质越发凸显为“以人为本”——在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平衡中,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伦理意识与情感温度的科研人才。

总之,在技术狂飙的时代,导师的角色不应被削弱,而需重新定义。导师的核心使命在于守住学术伦理的底线,激发创新突围的勇气,以及传递技术无法复制的人性温度。(作者分别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博士生)

向培养研究生科研“软实力”转移

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导师需主动拥抱技术,将其定位为协作工具而非竞争对手。

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完成文献初筛后,导师应重点训练研究生的理论整合能力,引导其从庞杂信息中探索研究趋势与创新空间等;借助人工智能模拟实验数据后,导师应引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近来,国内某顶尖名校大幅缩减文科招生比例的新闻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由于该方案是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要而制定的,因此较前两年北京某顶尖名校缩小文科招生规模的消息更引人注目。

现在看来,媒体、专家和网友对此的诸多议论,最终都归结到文科的“有用”抑或“无用”之上。如果就此辩论下去,恐怕不仅离题万里,而且永远无法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因为此次改革的主导者是明确承认文科有用,且非常重要的,但就是要削减文科规模。在他们眼里,文科的“用”在于“精”,不“精”的文科就没有“用”。这看似是一个价值判断,实则是一个现实判断,即不能为学校争取荣誉、经费和排名的文科专业就没有“用”。

当然,大学从来都不是现实之外的存在。既然在现实中,就必然会受到现实的影响。因此,适应时代要求也是大学之为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各种新生产力的涌现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空前的,大学更不可能置身事外。而作为公办大学,为国家建设服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然而,面对时代的巨变,作为教育机构的大学也需要有相当的稳定性,不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冲击下,失去基本定力。

适应时代需要与坚守基本定力本是一对矛盾体,理想的状态是相互平衡。但在现实中,这种平衡不易取得,往往会形成偏重一头的局面。当下国内大学的情况就是这样,“适应时代需要”明显重于“坚守基本定力”。

以“交叉”命名学院和专业就是一例。大学是以学科为细胞的,多数学科经历了百年以上的积累和沉淀,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更重要的是,这些学科体系并非封闭的,它们的开放性足以应对学科交叉的需要。然而,近几年某些大学设置的“交叉”专业甚至“交叉”学院,从名称上就有些让人不知所云,其本身的科学性也值得怀疑。“交叉”是动词或形容词。动词或形容词不可作为专业和学科名称本是常识。“交叉”也是一个极普通、宽泛的词汇,以此命名专业和学院既无法体现学科主体,又无具体专业指向,其外延更是无限的,显然与大学学科的专业性不协调。

学科交叉的目的是拓宽知识面,而新兴的所谓专业和学院却均是以“细”为追求目标而设立的。这种细化的研究方向并不能构成独立的学科,这样的交叉不仅存在内在的矛盾,形式与内容也明显偏离。因此,很多“交叉”机构的设立只是短期和策略性的,只有“应时”的意义,没有多少长久的价值。

大学之所以要坚守起码的稳定性,是因为稳定性不仅是教育所必需,也是科学研究,特别是原创性研究产生的基础。这个稳定性(或曰基本定力)首先体现在大学始终以自身为主体,将外部的新潮事物作为丰富自身的工具,以此维护主体,而不是相反。

科研工作存在着激烈竞争,但这种竞争不像在经济领域那样,非要争个高下或者相互取代,进而以金钱多寡衡量“成功”。它应该是建立在兴趣之上的相互补充、共享和共进。因此,科研工作的内容永远高于形式。“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固然可喜,但基础性的创新往往是“慢工出细活”。

名校缩减文科的理由之一是“为国家建设服务”。可是,这类“服务”并不是单一性的。因为“国家建设”既包括硬件建设,也包括软件建设。从某种程度上说,“全民文化素养提升”一类的“软件建设”的重要性是大于物质文明水平提高的。更何况,人工智能大模型对人工智能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影响也需要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加以评估。由此看来,“为国家建设服务”至少应是“双轮并举”。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服务器”的模式,在“产学研”的结合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不能因此要求所有大学都向它靠拢。即便是在美国,也有像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不同于“斯坦福模式”的成功典范存在。

国内各大学都有自身的传统,较之一窝蜂地追赶潮流,“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更符合大学的办学理念。面对“人工智能热”,一方面需要理性分析、努力适应;另一方面应该警惕非科学的“场外因素”的推波助澜。

跨学科不是摒弃原有的学科,而是为了在此基础上的“学科融合”。不重视原有学科,就意味着抛弃此前相对完善的基础。没有基础,原创性成果就无从产生。

应该看到,把基础性、原创性研究拱手让给经营性的科技公司,自己跟在后面敲边鼓,不是大学的谦虚,而是大学的失职。

「敲边鼓」不是大学的谦虚而是失职

(作者分别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博士生)